

众在日军统治之下，有着怎样的心灵史？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即便身处日伪政权下的那些人，也无法完全无视其民族意识的存在。作家王林的日记中写下一个案例，河北河间抗日政权的萧区长被伪公安局局长刘永江包围，弹尽自杀，伪局长知道萧区长在群众中有威信，“叫群众捐钱礼葬，群众捐钱甚多。礼葬时他却也来到坟上，感慨流泪地大哭道‘中国都像你萧区长可就好了’”^①。或许伪局长礼葬萧区长的举动只是收买人心，但他在祭奠萧区长时动用的中国话语，还是显示了“中国”这一概念在当年所具有的影响力，这是研究者不应忽略的。战时民族观念的生成及整个国民意识的变化，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课题，现在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还非常薄弱。

关于战时中国的研究，可以做的课题当然还有很多。呼吁加强对默默无闻的个体的研究，绝不是说大的宏观性研究就可以忽略，更不是说政治、军事的研究无足轻重。实际上，和前者相比，后者仍然是研究的基础。只是说就研究的现状言，前者更为薄弱，更需要众多研究者入手和重视。何况在战争和灾难中，那些弱小的人们最容易被摧毁，也因此造成更多的无法发声者。倾听这些静默的声音，是后人无可回避的责任。我们踩踏了无数遍的基石，有时，正是历史的灵魂所在。

（本文作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抗日战争军事史研究中的问题及可能突破的路径

袁 成 毅

抗日战争史研究存在两种理解：一是对抗日战争时期历史的研究，二是仅限于对这场战争本身的研究。前者涉及很宽泛的领域，但凡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社会等均属于研究对象；后者则偏重这场战争的具体过程，属于军事史研究范畴。无论从哪个层面研究抗日战争，学界业已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亦即战争时期的问题多由战争引起，战争本身无疑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但从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军事史研究其实最为薄弱：一是抗战军事史的研究成果明显少于其他领域；二是抗战军事史研究成果的军事史学科属性不够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不足，有些方面甚至还很少有人问津。针对这些现象，不少学者在相关论著中呼吁，抗战史学界应更加重视抗战军事史研究。当然，如何加强和深化抗战军事史研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笔者仅就当下抗战军事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作初步梳理，并就可能实现突破的路径略陈管见。

一、正面战场的研究视野有待拓宽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弥补以往正面战场在抗战史叙事中的缺失，学界从不同层面持续开展了正面战场军事史料的整理工作^②。同时，台湾地区战后编纂的各类战史资料也得到较多利用。此外，随着民国档案的刊布与开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正面战场军事史研究受到关注，产出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论著。但从深化正面战场研究的角度来看，研究视野似有进一步拓宽的空间。

（一）正面战场初期作战，战争形态的变化未受到足够关注

在近代世界军事变革的历史上，陆海空三军立体作战早已成为战争常态，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则是第一次经历这种立体作战的战争形态。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由于经济实力等原因，国防建

^① 王林《抗战日记》（1940年10月16日，《王林文集》第5卷，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第197页。

^② 关于军事史料整理与利用问题，可参见笔者《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史料整理与利用》（《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7期）一文，此处不再展开。

设的重点集中到陆军,海军和空军建设虽也采取了多种举措,但无论是规模还是实力都严重滞后。尽管如此,毕竟还是初步奠定了三军协同作战的基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在国民党军队承担作战的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主要兵种是陆军,战史研究突出陆军作用本是应有之义,但国民政府有限的海军和空军力量及其作用的发挥,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一时期,现有研究则鲜有对陆海空三军配合作战的关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国民党战场战史编纂的分工大有关系。在抗战还在进行的时候,国民政府即开始了战史编纂,陆海空三军各自编纂了本系统战史,其中陆军战史所占比重最大。抗战胜利初期,国民党军界的陈诚、何应钦、白崇禧等人所著战史也主要是叙述陆军作战经过,对海军和空军的作战只是简单提及。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其“陆军”“海军”“空军”以及“地面防空部队”仍然由本系统独立编纂相关战史。“三军”史料相互独立的呈现形式直接影响到战史研究,无论是战时还是在战后,学界对陆海空军抗战的研究,很自然形成了三个相互独立的体系,其中陆军地面作战成为战史叙事的主体,海军、空军抗战史事只体现在专门研究海军和空军的相关论著中,而在全景式抗战军事史著述中,很少看到对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的整体考察。

以1937年淞沪会战为例,关于地面部队的作战已研究得相当深入和细致,海军和空军在战役中发挥的作用却未得到显现。就海军而言,虽然未在沿海与日本海军展开大规模正面作战,主要是在长江口将大量军舰和民用船只沉入江底,设置起阻塞线,以此阻挡日本军舰溯长江西上,其中江阴阻塞线使日本海军滞留上海一带近四个月时间,不但打乱了日本海军预定作战计划,而且为国民政府陆海军在长江中游的部署赢得了时间。对1938年武汉会战的研究,也存在类似情况。南京沦陷前后,国民政府海军沿长江一线构建了层层阻塞线,其中马当阻塞线的阻敌效果尤为突出,迫使日军不得不推迟大举进犯武汉的时间。诚如陈绍宽所言:“马当的阻塞,直把敌人军舰压迫在芜湖方面,达半年之久,其间不知道给我们争取了多少有利时间,来从事保卫大武汉的军事配备,到了二十七年六月,敌人运用陆军力量,向马当采取迂回战略的时候,敌舰才勉强在其陆军护翼下,向我沿江正面海军要塞阵地活动,但没有法子突破,反给我们炮队击伤了几艘军舰,终要等待到它们的陆军施展出很大的兵力,把我们要塞包围,我们奉命放弃了之后,敌人的军舰才慢慢地扫着雷,一步一步挨进来,但我们消耗战和持久战的目的,已经达到了。”^①

国民政府空军在淞沪会战期间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淞沪会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空军能用于实战的飞机不到300架,基本上全部部署在南京以及周边的南昌、句容、蚌埠、广德、杭州等空军基地。会战爆发后,日军不但动用了在上海地区的全部航空兵力,而且还不断从国内增调航空队来华,作战预案就是在开战数日内完全消灭上述空军基地的国民政府空军。尽管双方实力极为悬殊,但争夺制空权的作战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月,为之后持久抗战格局的形成作出了贡献。由此可见,全面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作战,也是中国初次经历有别于传统战争形态的新式战争。无视战争形态的这一重大变化,就很难对正面战场初期的抵抗作出全面评判。

(二) 正面战场中后期作战,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未作打通研究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论断主要强调了三个层面的内容:中国战场是对日作战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战场牵制日军,使其无力北上进攻苏联,支援了苏联的卫国战争;中国战场的艰难抵抗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英美等国争取了更多备战时间。如果仅仅从这三个层面理解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起码在军事史层面上是不够的。就东方战场而言,也存在着两个战场:一是中国战场,二是太平洋战场。大体上说,中国战场承担着对日本陆军作战的主要任务,太平洋战场承担着对日本海军作战的主要任务,两个战场共同构成了反法西斯的东方战场。

^① 陈绍宽《三年来海军抗战工作之检讨及今后发展之方针》,海军司令部编译处编《海军抗战事迹》,1941年印行,第26页。

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虽然在地域上有所分隔,但两个战场密切关联,互为战略支持。而现实的研究情况是,日本方面的战史将在中国战场的作战和在太平洋上的作战,分别称为“中国事变”作战和“大东亚战争”作战,有意割裂了两个战场的关系。实际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战场的抵抗和战局演变,深刻影响着日军对英美开战的时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方面,日军不得不动用相当多的兵力到太平洋战场,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它在中国战场的军事布局;另一方面,美军在太平洋上的作战并非孤立为之,有些战事直接依赖中国战场,有些则间接依赖中国战场。因此,中国抗战军事史理应重视对太平洋战场的研究,重视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在军事上的互动关系。但长期以来,学界较少将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作打通研究。

应当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当美军与日军在太平洋海面和海岛作战的同时,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军事动向很多与太平洋战场的进展紧密关联。就中日陆军作战而言,1941年12月至次年1月,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作战目的主要是防止中国军队利用广九铁路策应英军香港作战;1943年11月、12月,日军发动常德会战,目的是牵制中国军队向云南、印度调动,防范中国军队对太平洋战场和印缅战场的策应。1944年5月至12月,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了空前的豫湘桂战役,目的是摧毁设于中国西南地区的美军空军基地,打通中国大陆内部以及大陆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交通线。对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发生于中国战场的这些战役,研究视野若仅限于中国战场,就很难看到中国军民付出巨大代价的战略意义。以豫湘桂战役为例,我们往往只注意到这场战役中国军队失败的一面,但如果将其与太平洋战场联系起来,就会发现这场即使是失败的战役,也仍然发挥了部分牵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作战的作用。1942年以后的缅甸战役更是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联动的作战,既往研究较多注意到中国方面打通国际援华通道的单向诉求,较少关注美英对中国责任的期望。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军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是极其重要的作战内容,美军实施这一战略更与中国战场密不可分。美军对日本本土空袭不但凭借了中国战场的基地,而且也让中国承受了日本在中国战场大规模地面作战的代价。1942年4月,美军以中国东南浙赣境内机场作为实施对日本本土空袭的返程基地,在太平洋上实施了“杜利特尔空袭”计划。日军为了中止美军这一作战方式,很快在中国战场发动了浙赣战役。1944年,美军欲将B-29轰炸机部署于中国西南地区,由此出动空袭日本本土。当年四川省发动了50多万民众,在成都附近的新津、邛崃、彭山、广汉等地为美军修筑大型机场。^①国民政府防空部门也在大巴山、米仓山、秦岭、汉水等地布置了防空监视哨,这才有力保障了美国B-29飞机的出击。罗斯福总统在致国会报告中曾评价道“驻华美空军的成果多赖中国防空情报网对敌机作迅确报告,此项情报网竟延伸至敌军占领区内,中国最缺乏最新式之通讯工具,但仍为世界上最快且最有效之情报网。”^②美军从中国基地出发实施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成为此后对日本大规模本土空袭的预演。但现有研究较多地关注到美军在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上频繁出动机群对日本本土的“地毯式轰炸”,而较少关注美国早先从中国大陆实施对日本本土的出击。若将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打通研究,自然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二、敌后游击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待充分展现

敌后游击战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是对日游击作战的主战场,对敌后战场游击战的研究,最主要的是对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战场研究。此外,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武装也在众多地区开展了对日游击作战。从现有研究成果看,敌后游击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还有待更充分展现。

(一) 中共敌后战场游击作战的复杂性展现不足。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也称解放区战场,早在

^① 《蒋委员长电勉川临参会: 川省同胞肩负抗战重荷,最近修筑机场贡献尤伟》,《大公报》1944年6月18日。

^② 黄镇球《防空在今后国防上的新估计》,《河南省政府公报》1945年第4期。

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就对敌后战场的开辟、地位与作用进行了概括,这也成为指导后来研究的重要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研究,比较集中的成果是关于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后战场的基本战略方针、敌后战场的形成时间和标志、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及何时成为主战场、敌后战场是否存在战略反攻等较为宏观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指出,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战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有许多值得研究和需要深化的问题,如日军在敌后战场的战略与政略、敌后战场的政治动员和民众作用、“扫荡”与反“扫荡”战、局部反攻阶段的重要战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武装建设问题、民兵组织与民兵作用、敌后游击战与敌后城市关系等^①。但从近些年发表和出版的研究成果看,以上提到的这些问题还有很多没有受到抗战史学界的关注,即使仅就游击作战的经过而言,目前的研究也主要限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日作战的一些重要战役,如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等,缺乏对更多经典战役的挖掘;对敌后游击作战形式的研究多偏重敌后军民与日伪军的直接军事对抗,对游击战的多种形式如山地游击战、平原游击战、河湖地带游击战的共性与差异性缺乏比较研究。此外,对非直接军事对抗形式,如破袭战、信息战、交通战、情报战、“锄奸战”等也缺乏深入探讨。

(二) 中共敌后游击战对正面战场的战略配合,多以宏观结论代替实证研究。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对正面战场形成了强有力的战略配合,虽然一些重大的战役由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承担,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地民众武装,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广大地区开展的游击战,极大地制约了日军的部署与调动。中共领导的每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差不多都起到了对正面战场作战直接或间接的配合。对这种配合的关系,仅限于宏观上的结论或认知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实证研究加以诠释。如抗战初期八路军进入山西后,形成了对进犯山西日军的极大牵制,其中的平型关战役既是八路军对日军的首次作战,也是八路军对第二战区正面战场作战的重要配合,而既往研究往往忽视了后面这层作用。如果能以中共领导的某支武装力量或某个根据地为例,具体探讨其对正面战场的影 响,可能会更加突出中共敌后游击战的价值和意义。

(三) 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研究,存在以省域代替根据地的“碎片化”现象。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主要依托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而敌后抗日根据地基本上处于数个省域的交界地带。因此,只有将根据地作为地域单位开展研究,才能真正揭示中共敌后抗战的面貌。但近些年来,区域史研究在各地不断受到重视或强调,各省区均出版有本省区抗日战争的史志著作,无论是区域史还是地方志,往往有“越境不书”的要求,因此很容易导致将敌后战场的历史“碎片化”地呈现于不同省域的结果,这对深化敌后游击战历史研究非常不利。以华中根据地新四军的研究为例,由于涉及江苏、浙江、安徽等多个省份,各省分别叙述所在省的史事,显然很难揭示新四军华中抗战的整体面相。

(四) 中共敌后游击战研究的史料来源不够丰富。档案资料本为战史研究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但由于目前档案开放较为滞后,研究者基本无法利用。好在战后不同时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系统编纂了众多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等游击作战的战史资料,加之众多人物的回忆资料等,成为研究敌后战场最主要的史料。由于史料编纂本身具有选择性和局部性,研究者在无法利用档案资料的情况下,只能利用已刊战史资料,从而造成了史料来源的单一,这就很难对游击战这种特殊作战形式作出深入细致的分析。当然,史料运用在客观上存在的困难是,游击战多数是小规模作战,日方大型的战史资料也很少有反映,作战过程多反映在一些联队作战记录或中下层官兵的阵中日记,研究者一般很难利用到这些资料,这就使得作战双方的史料无法得到相互印证,影响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

^① 杨圣清《抗日战争敌后战场研究述评》,杨青、王旸编《近十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选编(1995—2004)》,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240页。

(五) 中共武装力量对日作战与“反顽”作战存在相提并论的现象。从军事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共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对日作战应成为中共抗战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也是体现战时中共“中流砥柱”作用的重要佐证。虽然中共武装力量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武力压制,双方甚至多次发生武装冲突,迫使中共部队不得不在对日作战的同时展开“反顽”作战,但对日作战与“反顽”作战性质有别,若将其相提并论,无疑会淡化中共武装力量在对日作战中的巨大历史贡献。

(六)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研究,正规军和地方武装兼顾不周。国民党在敌后的游击战主要有两方面的力量:一是国民党正规军,二是国民党在各地的地方武装。早在淞沪会战结束后,从战场上撤退下来的部分国民政府军就在苏浙皖边区开始了游击作战。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正面战场战事的减少,国民党正规军多在敌后开展对日游击,学界对国民党正规军的游击战已有较多探讨。相对而言,对国民党在敌后游击战的另一方面力量——地方武装的研究则明显不足。如在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十分重视游击战,他认为“必须将游击战与正规战互相配合,巧为运用,然后方可以发挥其本身之最大效能,以收克敌制胜之效果”^①。基于这种认识,浙江省战时组建的国民抗敌自卫团,在对日游击作战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其他各省也有类似地方武装,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研究似有重视这些武装的必要。

三、抗战军事领域一些薄弱环节有待加强

军事史是一个涉及内容十分广泛的学科领域,它包括军队统帅部及各战区的指挥运作、战略方针和部署、战术运用、军队状况、军事训练、政治工作与动员、作战能力、后勤保障、战区与后方关系、军政关系、党政军民关系、军事动员、供给支援、军种协调、战区配合等等^②。以上这些方面当然是军事史研究的基本内容,除此之外,还有涉及抗战军事史的诸多领域,值得深入探讨。

(一) “敌情研判”与决策机制。全面抗战爆发前,中方对日本发动战争的时间、可能采取的战略战术都有过研判。同样,日本方面也对中方可能采取的抵抗作过预判。中日双方都是在互相研判的基础上,通过各自不同的决策机制形成作战方案。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作战双方都十分重视对对方的研判,并根据研判的结果谋划下一步军事行动。既有研究对战前中日双方的互相研判和决策较为关注,对战争过程中的相互研判与决策则关注不够。近年来,随着《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的出版,为研究日本方面的研判与决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同时,蒋介石档案、日记以及战时国民政府高级将官回忆录和日记的广泛利用,为研究国民党方面的研判和决策也提供了便利。此外,借助诸如战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编《敌情研究》以及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整理的“日本问题”“沦陷区问题”等资料集,有关国共双方的“敌情研判”也有望产出新的研究成果。

(二) 战前国防建设。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即启动了应对日本侵略的国防建设。江海防方面,主要是对沿海的虎门、厦门、镇海、江阴等要塞进行了整理;空防方面,重点是通过组建航空学校和防空学校,培养了急需的航空防空专业人才。对于这些建设内容,学界有比较多的探讨。相对而言,国民政府战前投入最大的是陆上国防工事,1935年国民政府军方在制定《1936年度国防计划大纲》时,将全国不同省份分别划分为“抗战区”“警备区”“绥靖区”“预备区”^③。国民政府军方认为,京、沪一带不论从何种角度来看,都是日军进攻的重点。基于这一判断,国民政府开始了“以首都为中心,逐次向国境线推进”的陆地国防工事建设^④。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已完成的国防工事主要集中在以南京为中心的江浙地区。由于国防工事属于机密工程,除档案资料

^① 黄绍竑《游击战之理论与实际》,金华《浙江潮》1938年第14期。

^② 曾景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述评》,杨青、王旸编《近十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选编(1995—2004)》,第262页。

^③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2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1—362页。

^④ 何应钦《对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何上将抗战时期军事报告》(“民国丛书”第二编32),上海书店(据1948年版影印),第6页。

外,一般很难利用其他文献开展研究,相关的研究因此还不够充分。此外,对于战前国防工事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也缺乏实证性的研究成果。

(三) 国防地理与作战地域分布。中国国防地理的态势决定了日本对华发动战争的区域格局,抗战军事史的研究必须关注中国抗战的国防地理或军事地理。早在全面抗战前,学界和军政界就有许多讨论,如何应钦、蒋百里等都有关于中国国防地理的探讨。战时以胡焕庸为代表的学者更是就中国国防地理形势进行了非常系统的研究,但战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十分薄弱。事实上,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是需要从军事地理的角度加以解读的。一是日军占领区。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方面对占领中国哪些地区是有明确主张的,但随着战局演变,不得不作出调整,如对于华南,早在1935年的日军作战预案中就提出占领福州、厦门,如需要还可占领汕头^①。但由于华北和华东战事的胶着,日军推迟了好几年才占领这些地区。因此,关注作战的地域问题,有助于解释日军不同阶段的作战意图。二是作战地域上呈现的特点。中日开战初期的作战主要集中于平汉、平绥、津浦、沪杭、京沪等重要铁路干线,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的张嘉璈就将抗战初期的作战称为“铁路线争夺战时期”^②,美国学者萧邦齐也称抗战初期中日正面战场的作战为围绕铁路线的“交通战”^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西南地区联结印支半岛国家的重要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桂越铁路线等也成为交战焦点。因此,聚焦重要交通干线的作战,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现代战争与传统战争的区别。三是国民政府战区划分与战场格局。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全国划分为不同战区,各个战区在不同阶段承担不同任务,有时是主战区域,有时是游击区域,且各个战区的作战效果相差悬殊,以战区为“单位”的军事史研究目前还比较少。

(四) 典型战役的进一步挖掘。聚焦正面战场的22次会战和敌后战场的主要战役固然重要,但在战争的特殊时期,有些战役虽取得胜利,但关联的作战还未结束,出于减少敌方注意的目的,这些战役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大张旗鼓的宣传,如在1938年春徐州会战期间,各方注意力都集中到津浦路北段,而第三战区作战部队在江南作战取得的胜利就很少为人所知,特别是在安徽广德县流洞桥附近的作战,规模很大,战绩明显^④。战时就有人指出,在津浦路北段,“我们对敌军歼灭战略的成功,已经为全国民众普遍知悉,但是江南敌军对于我们歼灭战略的惨败,则因为种种缘故,还未为各地深刻认识”^⑤。因此,除了对重大战役作继续深入的研究外,还应当进一步挖掘一些在作战手段、作战效果等方面具有独特性的战役战斗。此外,作为现代战争,自己部队的误伤现象或事故同样值得研究,这在陆战、海战、空战中均有典型事件发生,对于这些问题似有关注的必要。

(五) 战绩评价的问题意识。在抗战军事史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将一场战役中双方兵力投入、歼敌人数、自己人员伤亡作为重要议题,由此证明作战是否惨烈、战略是否正确等,这已成为军事史研究中最常见的问题意识。事实上,就一些小规模的作战而言,中日双方投入的兵力本身并不多,是否有必要弄清这些数据,很值得反思。如1938年2月,苏浙皖边的国民政府军第59师在浙江孝丰、安吉一带多次与日军展开作战,该师战斗详报称日军伤亡人数400人至500人^⑥,显然数字有所夸大。由于我们无法从日方战报中完整地了解到这些作战的情况,若要花费很大精力考订这个数字是否还有必要?对于这一类小规模的作战,可能还需要在既往研究中提炼出新的问题意识。

(六) 兵役制度的实施与武器装备等。兵役制度是国家重要的军事制度,国民政府《兵役法》的制定与实施、从中央到地方多层面的兵役行政体制和国民兵役制度以及兵役制度的实施等,都是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0页。

② 张嘉璈著,杨湘年译《中国铁道建设》,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35页。

③ R. Keith Schoppa, *Revolution and Its Past*, Upper Pearson Education Inc. Saddle River, NJ07458, p. 258.

④ 《流洞桥附近歼灭战》(193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七八七-6538。

⑤ 王叔明编《抗战第一年》(上),商务印书馆,1941年,第187页。

⑥ 《第五十九师孝丰、安吉各役战斗详报》(1938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七八七-8397。

值得研究的重要内容。如兵员的征募，从征兵开始到正式进到部队，涉及地方政府和军事单位多个方面。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既可从制度史层面着手，更需通过个案研究展示历史的复杂面相。此外，武器装备也是军事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国民政府军还是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武器装备普遍存在水平低、重武器短缺的现象，解决的途径主要靠扩大制造、缴获敌方武装、争取外国援助等。对于这几种方式的研究，自制武器的问题和外国援助的问题，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关于国共军队缴获日军武器的个案实证性研究还很少。事实上，缴获武器的状况很能够反映作战的真实面相。据 1944 年叶剑英的介绍，仅八路军和新四军截至当年 5 月，即缴获日伪军的长短枪分别达 18.9 万支和 12.4 万支^①。如果对此数据加以细化研究，能说明很多问题。

综上所述，中国抗战军事史在诸多领域还存在着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期待学界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共同推动和深化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

（本文作者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区域抗战史研究的关怀与路向

吴 敏 超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的反侵略战争。进入 21 世纪，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和资料整理都取得了长足进步。2019 年 11 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八卷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综合反映了国内抗战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当然，这亦是一个新的起点，研究者仍然需要在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资料搜集与出版、研究方法与视角创新上不懈努力，寻找新的学术兴奋点和增长点。面对极大丰富的档案资料的开放和种类繁多的数据库的建成，研究者在绝大部分专题上不再感叹无米下炊，而是更多地思考如何在披沙拣金和抽丝剥茧的过程中提炼问题意识，凝聚学术智慧，将抗战史研究推进至更高水平。而进一步推动区域抗战史研究，应该是深化中国抗战史研究的一种可能取向。

首先，对“区域抗战史”概念的提出略作阐发。区域抗战史的两个关键词是“区域”和“抗战”，后者比较明确，即 14 年中国抗日战争。前者的定义和范围可以探讨，笔者倾向于将“区域”理解为拥有一定社会历史发展特征和自成系统的历史地理单元。根据讨论抗战时期问题层面和关注焦点的不同，可以是诸如华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等较大范围，也可以是诸如杭嘉湖平原、大别山区、苏北地区或者珠江三角洲等较小范围，甚至是更小的区域。无论范围大小，可以确定的是该区域在抗战过程中共享了一些同质性要素，如客观存在的山川地理、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区、相似的民风民俗，以及战时特有的军事战区划分（如国民政府第三战区或新四军活动区域）、政治统治力量（如汪伪政权统治区域）等。

实际上，区域抗战史的研究已有相当积累。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习惯将抗战时期的中国大致分为国统区、中共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对这些区域（更多是对区域中的区域）抗战的研究，构成了以往区域抗战史的主干，并呈现越来越深入的趋势。具体而言，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通过发动淞沪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桂南会战等战役，占领了中国华北、华东和华南的广大平

^① 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1944 年 6 月 22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第 617—618 页。